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 媒介动员的实践路径及成效

李中泽, 杨文选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有效动员和教育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传播党的先进理论与政策,在环境封闭、经济文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形态多样的媒介动员实践。通过劳动竞赛、劳模塑造、群众自我书写等具体策略,成功宣传了党的革命思想与施政方针,教育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并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这一实践密切了党与边区群众的联系,巩固了党的领导和边区政权,扩大了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其宝贵历史经验,亦为新时代党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媒介动员;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133-09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回顾这段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兵民是胜利之本”^①的根本立场,深入践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的动员理念,充分整合各类媒介形式,广泛发动群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③,这成为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核心任务在于“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④。而彼时的陕甘宁边区,受限于多重现实条件,如何构建适配边区实际的媒介动员体系以支撑抗日模范宣传,成为党推进抗战事业、落实核心策略目标过程中必须直面的关键环节。

在此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核心目标,开展了一系列规模空前、形态多元的媒介动员实践。本文立足陕甘宁边区地理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封建思想残留等特殊社会生态,系统考察边区媒介动员的历史必然性、实践路径与战略价值。既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传统媒介并创新传播策略,也辨析党报党刊、无线广播、文艺宣传及民间口头传播等不同媒介形态的功能定位与传播机制,进而评估其在增强民众抗战意识、开展生产与巩固边区根据地等方面的实际效能,最终揭示该实践对维系敌后抗战、推动全面抗战胜利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媒介动员的时代背景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极度滞后,民众文盲率居高不下,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大规模文盲群体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党的政策的传播与落地,更对全民族抗战动员构成了现实

收稿日期:2025-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XW022)

作者简介:李中泽(1991—),男,陕西西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6页。

④王姗姗:《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页。

梗阻。因此,通过有效的媒介动员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唤醒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完成的时代任务。

陕甘宁边区位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地处黄土高原核心区域,自然环境恶劣,旱涝、风雹等自然灾害频发,毛泽东曾指出该地区“地瘠民贫”。经济以农业和个体经济为主,工商业基础薄弱,几乎无近代工业,手工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农业生产长期以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为主,粮食难以自给。文化教育方面,资源严重短缺,边区90%以上的人群为文盲,农村很难找到一个读信、写信、写对联的人。1936年,徐特立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边区教育现状时指出:“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①1937年,边区所辖范围内也仅有小学120所,在校学生仅2000多人^②,社会教育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大量文盲和半文盲的存在,使得民众无法阅读书报、书写文字,更难以理解和接受新知识。

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落后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广大乡村,愚昧与迷信思想盛行,妇女缠足、早婚等陈规陋习普遍存在;赌博、投机及“二流子”行为蔓延,种植及吸食鸦片现象较为普遍,民众深受其害。同时,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困境,人畜死亡率极高,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也有3%^③。全区范围内缺医少药,民众遇事多诉诸鬼神问卜,巫神数量多达两千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清除民众长期形成的封建思想与落后观念显得尤为艰难。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媒介动员,是指政治行动主体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多种传播媒介,系统性地向目标受众传递经筛选和构建的信息、符号与价值观,从而激发、引导并整合公众的情感、认知与行为,使其支持或参与特定政治运动、社会变革或集体行动的过程。全面抗战时期,这一动员的根本目标在于广泛发动群众,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众力量,建设边区,坚持抗战。然而,边区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等民生环境极端落后的现实状况,严重制约与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的有效传播。面对这种严峻的社会现状,利用媒介手段在边区开展宣传教育,革除落后与封建思想文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媒介形态及传播途径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逐步建立起涵盖报刊、广播、戏剧、歌曲等在内的多元媒介体系。各类媒介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协同运作,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立体化的传播网络,有效支持了边区的社会改造与抗战动员工作。

(一)党报党刊:媒介传播的核心载体

报纸和杂志是陕甘宁边区开展宣传教育、普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核心媒介,在其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党报作为最重要、最权威的舆论宣传工具,承担了发布政令、宣传政策、教育干部、鼓舞士气等多重功能。抗战时期,《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曾先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党的主流媒体,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聚焦抗日战争进展、国际局势演变、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推进、文化教育普及等重大议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传播的核心舆论阵地,在宣传动员与舆论引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1937年1月创刊的《新中华报》,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的机关报,肩负“民族喉舌”的重要使命,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正面的宣传报道,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更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化与稳固。《新中华报》的内容与形式兼具时代特征与爱国主义色彩,堪称延安时期党媒宣传的典型样本,毛泽东曾评价其为“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④。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②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③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④毛泽东:《强调团结和进步》,《新中华报》1940年2月7日。

早期党报的直接对象并非普通群众,而是党的各级机关干部。干部通过阅读报纸,不仅获取大量信息,更能准确把握中央的方针政策。党报构成了党的通信网络的中枢,成为各项开展的参照系与坐标轴。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传统办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边区及军民的实际需要。为此,党中央启动党报改版工作,其核心目标并不是单纯追求发行数量的增长,而是推动办报模式从城市宣传向农村根据地宣传的转型,以契合全民抗战动员的现实需求。1941年5月,《新中华报》改版并正式更名为《解放日报》,成为边区第一份大型日报。该报经常分析国内外形势,刊载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党在边区的核心思想载体,也是高级干部与知识分子了解时局、把握政策的主要渠道。

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博古在党报改版后明确指出,党报所言的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①,党报记者不是根据自身的兴趣来选稿和撰评,而是要根据党的工作的需要和意志进行。基于此,党性原则要求“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②。此次改版重新界定了党报与政党的关系,党报不再是要作一面“镜子”去将发生过的事实复述一遍,而是要作为党的“喉舌”,既要承担群众宣传者、鼓动者的角色,更要履行群众组织者的职能。

陆定一曾批评部分编辑记者受资产阶级“性质论”影响,过度追求稿件的“趣味性”。此次党报改版并不是否定新闻规律,而是强调内容须符合党的需要。早在改版前,博古就在《解放日报》编委会上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马马虎虎、夸夸其谈是党性不纯的表现”^③。在《解放日报》创办初期,他指出党报需要在专业能力建设上下苦功,要求记者提升业务技能,并提出“我们办报、写文章要能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有兴趣来看,必须在文字上特别注意。文字要生动,要让读者不感到枯燥无味,消息、通讯不能公式化。既可以写得无一人要看,也可以写得人人非看不可”^④。

为了解决《解放日报》理论性较强、普通群众阅读困难的问题,1940年3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边区政府以广大工农兵群体为主要读者对象,创办了《边区群众报》,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该报采用口语化、通俗化的表达,甚至融入民歌、说书、快板等民间文艺形式报道新闻,文字易懂、形式鲜活,深受边区民众喜爱,致使该报在仅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发行量很快达到1万份。群众称赞其“念得顺口,听得顺耳”^⑤,真正实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此外,边区还陆续创办了《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学习导刊》《中国青年通讯》《大众文艺》等几十种期刊,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动员,有效拓展了媒介传播的覆盖范围,显著提升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革命意识和抗日觉悟。

(二)广播电台:传播四方的空中红色电波

陕甘宁边区因纸张匮乏,纸质媒介的传播范围受到严重限制。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力传播党的声音,争取国内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亟须一种能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信息高效传播的新媒介。毛泽东率先提出在延安建立党的无线广播电台的设想,在此背景下无线广播电台应运而生。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王皮湾村首次播音,标志着党领导的广播新闻传播事业正式起步。其信号不仅覆盖边区城乡,还远达国统区与沦陷区,向全国乃至国际社会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报道敌后抗战实况、揭露日军暴行与国民党消极抗日行为,被誉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⑥。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的传播价值,专门要求各根据地与地下组织主动接收延安广播信号。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重庆《新华日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每日收听延安广播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收听、抄录广播内容,党组织和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在1941年《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地应不惜代价去设立收音机,以保证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广播。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电台广播工

①《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页。

②《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472页。

③《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

④《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

⑤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3页。

⑥伍义林:《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7页。

作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广播电台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此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开通多语种广播,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抗战声音,不仅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版图,更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显著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设不仅突破了此前边区以纸媒为主的单一传播格局,实现信息的“有声化”,更进一步冲破传统媒介的时空限制,使党的声音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传达至不同受众,显著提高了传播效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文艺宣传:最具群众基础的大众媒介

针对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边区党和政府以民众喜闻乐见的直观性文艺活动为载体,开展广泛的革命普及教育与抗日宣传动员,构建起兼具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大众媒介渠道。

戏剧在边区的文化教育与动员中占据重要地位。边区戏剧形式丰富,涵盖秦腔、歌剧、平剧等流传较广的民间剧种。延安文艺界积极对民间艺术进行改造与利用,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核心创作团体。这些团体深入基层,将陕北民歌、民谣、说书等民间艺术元素融入戏剧、秧歌等创作中,并与抗日救亡、阶级教育、大生产运动、扫盲教育等现实政治主题深度结合,创作出现代秦腔戏《中国魂》《血泪仇》、歌剧《白毛女》、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等经典作品。此类戏剧以具象化的艺术表达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有效弥补了报纸杂志等文字媒介在低文化群体中的传播局限。全面抗战时期,民众剧团始终活跃在边区乡村,巡演覆盖23县(边区共31县市),190处市镇村庄,累计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演1场),观众达260万人次^①,有力推动了抗日革命思想深入边区城乡角落与军营阵地。

秧歌剧是边区最具普及性的大众化艺术形式,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其尚未进入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视野,当时部分创作者更热衷于“排大戏”,存在“关门提高”的倾向。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需厘清“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②这一根本问题,强调文艺应面向工农大众,“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③。在此指引下,专业文艺工作者转向民间,深度参与群众性秧歌活动,鲁艺组建百余人的秧歌队,将秧歌表演带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对此,毛泽东评价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④

鲁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在编排秧歌剧时特别注重大众性原则,形式上保留扭秧歌、打腰鼓等传统肢体语言,避免过度舞台化;参与上主张开放性,鼓励农民、士兵直接参与演出,淡化专业演员与群众的界限;内容上强调生活化,以“劳动生产”等日常生活为题材,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灌输,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宣传教育功能。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的演出形式,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成功介入民间艺术的重要标志。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优秀作品,使农民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秧歌剧的即兴对唱中实现了审美话语权的转移。经典代表作《兄妹开荒》,以陕北传统秧歌为基础,剔除调情、鬼神等“封建糟粕”的内容,注入“劳动光荣”“抗日救国”等鲜明革命主题,并通过专业化的剧本创作、音乐编排和动作设计,提升为兼具政治宣传功能与艺术感染力的新型文艺作品。剧中“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等唱词,运用陕北方言将日常劳动诗化,使田间劳作升华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实践,深刻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理念。

边区的歌曲创作与大众合唱活动具有显著的政治动员功能,成为沟通感情的媒介、唤醒民众的号角、奋勇杀敌的锐器。全面抗战中,《黄河大合唱》《军民大生产》《东方红》等反映抗战精神与群众生产生活的优秀歌曲相继问世。《黄河大合唱》弘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传统,彰显了“黄河文化”的精神力量。这部被誉为中华民族“音乐史诗”的作品^⑤,以黄河象征民族精神,通过恢宏的合唱形式激发歌者

①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27页。

⑤马广荣:《回望与思考: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与听众坚定的抗战意志,“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①《东方红》作为陕甘宁边区新民歌的代表作,以朴实的语言唱出人民群众对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情感,成为传播最广的革命歌曲之一。

诗歌创作同样十分活跃,其内容紧贴民众生活与反映战时现实,以街头诗运动、诗朗诵运动等形式广泛传播,深刻体现了文艺与群众结合的时代特征。艾青曾提出,“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②,这一理念成为当时诗歌创作的重要指导。1938年4月,柯仲平创作的长诗《边区自卫军》,以边区农民武装斗争为题材,成功塑造了一代新型农民形象,是大众化与民族化诗歌的代表作。1943年3月,《解放日报》刊发了艾青的叙事长诗《吴满有》,该诗以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生动表现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热情与才能,语言通俗化、大众化,深受民众喜爱,动员和教育了民众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

文学作品中,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以通俗语言、农村题材和民族形式成为“大众化”创作的典范。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将初稿念给老百姓听取意见,并根据群众反馈反复修改。这种双向的知识流动打破了文化权力的传统单向结构,形成了“教者亦是学者、学者亦是教者”的新型文化生态。

(四)基层组织与黑板报:深入传播末梢的“毛细血管”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机构划分为边区、县、乡三级,其中乡政府又下辖行政村和自然村。因此,乡村基层党组织就承担着媒介内容最终落地的“神经末梢”功能。边区各村庄普遍创办黑板报,形成了多样化的宣传动员模式,仅绥德地区葭县在1944年下半年就创办黑板报67块^③,使党的政策深入基层,家喻户晓。黑板报由于具有内容贴近生活、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等特点,成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宣传动员的重要媒介,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延安桥儿沟乡的黑板报是宣传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的典型案例。该乡包括一条市街和五个自然村,共151户562人^④。黑板报的编辑和写稿工作均由群众来负责。1944年8月,乡政府组织全乡文化工作积极分子成立文化委员会,将黑板报交由委员会承办。每位委员均承担通讯员工作,同时发动和指导群众写稿,对于不识字的群众则由委员代笔。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无比高涨,稿件一时间应接不暇,部分优秀稿件还被推荐至《延安通讯》《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发表。

黑板报的内容紧密配合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真实反映基层民众生活。其内容涵盖时事报道、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政策传达等多个方面,文字口语化,并配有插图,深受群众喜爱。黑板报内容由识字者读给群众听,使群众能够便捷地了解时事政策。当时,群众将受黑板报表扬称为“上黑板报”,受批评称为“爬黑板报”^⑤,黑板报成为群众学习榜样和自我对照的“镜子”,有效促进了乡村文明风尚的形成。黑板报的编辑工作由夜校教员和学生承担,夜校不仅为群众提供识字教学,还将投稿群众发展为夜校学生,为群众提高识字写字能力和表达思想提供了实践平台。

作为党报传播系统的有益补充,黑板报发挥着类似“毛细血管”的作用,上接党和政府的声音,下连基层群众的心声,将政治动员和政策贯彻延伸至组织末梢,显著增强了党在基层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陕甘宁边区媒介动员的策略及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多元媒介为依托,创新实践劳动竞赛、劳模塑造与群众自我书写三大宣传动员策略,既高效传递党的政策主张,又充分调动民众参与边区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媒介动员范式。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③郭玉杰:《延安时期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学习时报》2023年10月27日。

④郭玉杰:《延安时期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学习时报》2023年10月27日。

⑤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一) 劳动竞赛:媒介传播的方向引领

1939年,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压力,边区陷入严重的物资短缺危机。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①他由此在全边区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推动部队开展大规模屯田生产,党政军民共同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边区政府强有力的组织与动员下,群众不仅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精神面貌也发生深刻变化,并营造出“劳动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大大激发了群众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将大生产运动与“抗日救国”的崇高目标相结合,是媒介动员的重要策略。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凸显普通劳动者的贡献,另一方面将个人生产成绩与集体竞赛联系起来。报纸不仅使劳动竞赛成为可见的公共事件,还成为经验交流与情感动员的平台。“劳动光荣”的观念既重塑了民众与劳动的关系,也带来实际物质激励,有效提升了民众生产热情。

党的主流媒体《解放日报》是劳动竞赛宣传的核心载体,从1943年至1945年刊发与生产竞赛相关的报道约270篇^②,涵盖农业、工业、运盐、纺织、总结生产经验等多个领域。1943年2月,《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杨朝臣与吴满有之间的开荒比赛,正式拉开生产竞赛序幕。不久后发表社论《生产大竞赛》,号召边区群众、干部和士兵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竞赛运动。朱德总司令及时回应,强调组织生产竞赛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并推广这一运动。

在媒介宣传与政策引导下,边区民众自发组织竞赛的热情高涨,纷纷以吴满有、杨朝臣为榜样发起挑战。甘泉驻军所在的黄蒿庄居民集体向吴满有提出竞赛要求,吴家枣园全村开展劳动效率比拼,《解放日报》则持续聚焦和报道此类自发性竞赛,且多置于显著版面,标题简洁明了、内容通俗生动,进一步扩大了竞赛的群众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竞赛规模从个人层面逐步拓展至村际、县际:延安向志丹、安塞发起竞赛挑战,安塞向志丹、子长回应挑战,延川向固临、延长提出竞赛条件等报道密集刊发。报道所传递的生产热潮氛围,有效激发了边区民众的参与热情,使生产竞赛逐步转化为全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

《解放日报》凭借报道内容的吸引力,促进了生产竞赛取得明显成效。1944年,边区机关、部队和学校等单位共生产细粮10万石,全边区细粮总产量较往年增加20余万石,在满足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及群众的日常消费之后,仍可结余细粮28万石^③,极大地改善了边区干部群众的的生活,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减轻了边区政府和群众的负担。民众对生产竞赛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提升,逐渐明白劳动能够创造一切财富,农业生产既是自救又是为了军民的丰衣足食。这使生产竞赛与抗战和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最终促使生产竞赛发展为全边区群众自觉参加的大生产运动。

(二) 劳模塑造:媒介传播的标杆作用

劳模运动与生产竞赛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生产竞赛过程中自然产生劳模。吴满有领导的吴家枣园,陈德发的马家沟,石明德的白原村,刘玉厚的郝家桥,张振财的城壕村,贺保元的贺家圈等典型集体^④,成为边区生产运动的先进代表。劳动英雄张清益号召全村男女老幼,将生产计划分为七个部分,实现全村穿衣完全自给,增开义田二十五亩的目标。他们不仅是生产能手,更是“劳动光荣”价值理念的重要象征。为扩大劳模影响力,《解放日报》开设专栏进行大篇幅报道,全面展示各领域劳动模范的生动事迹与成就。边区留守部队积极开展开荒竞赛,工业领域则着力培育“赵占魁式”的工人、学徒和技术工作者,为边区建设与抗战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党中央的宣传引导密不可分。边区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劳模表彰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既肯定劳模的贡献,又为劳模运动指明发展方向,还密切关注劳模宣传推广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特别邀请《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座谈,充分肯定了该报将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②刘盼,黄海涛:《劳动光荣:〈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生产竞赛的报道及其意义》,《党史文汇》2023年第1期。

③王伯英:《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运动中的劳动竞赛》,《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④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生产新闻和劳动英雄置于头版头条的编辑方针符合报纸的正确方向。由此可见,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边区劳模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与模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流子”群体。仅延安市,1937年前全市人口不到3000人,而流氓地痞就将近500人,占人口的16%^①。这些“二流子”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且极易被汉奸特务收买,或沦为土匪及反革命力量,对边区政权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将“二流子”改造为劳动者,成为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1943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改造二流子》社论后,掀起了全边区改造运动高潮。延安县在改造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典型事例,如蟠龙区某巫神将三山刀改制成镢头,公开宣布不再行骗,决心努力生产。通过系统性的改造,边区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好吃懒做的懒汉被看做是耻辱”^②，“二流子”逐步实现从游民分子向社会好公民的转变。1943年至1944年,改造率达到58.8%^③,许多经过改造的“二流子”不仅勤于劳动,积极生产,有些还被群众推选为劳动英雄。“二流子”群体之所以能实现上述根本性转变,劳模通过媒介传播所形成的示范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三) 自我书写:媒介传播的主体迁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媒介实践并不是由知识分子垄断,其最终效果在于媒介对群众的表达赋权,从而充分激发普通民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近代以来,部分知识分子虽认识到创作大众化作品需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却仍将文学艺术视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性载体,未能真正重构起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主体间性关系。这种以知识分子为绝对主体、群众为客体的认知模式持续至抗战前期,导致创作往往脱离民间真实生活。

群众主体性的真正确立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讲话》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启蒙关系,强调知识分子需向工农兵学习,实现主体地位的置换:工农兵成为老师的角色,知识分子则转变为学习者。在此之前,大众在中国近代启蒙进程中始终处于“面目模糊”的状态,书写权力长期被知识分子阶层所垄断。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媒介实践通过去专业化、去神圣化的书写权迁移,使书写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扩展到可培养为通讯员的普通工农群众。

边区开展的扫盲运动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旨在使普通群众掌握书写能力,并通过通讯员教育实现记者身份的大众化。工农同志的文章尽管存在一些词句不通、错别字较多的问题,但因其生动具体的表达和脱离党八股的文风而具有独特价值。知识分子作为“理发师”,通过《大众习作》《大众文艺》等期刊点评并刊载工农作品,构建了新型的文学生产关系。

赋权群众自我表达、自我书写的行为,从根本上打破了固有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传统分野。许多工农干部在投稿中认为写文章是有知识的人才可以写的,但通过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逐渐开始通过文化学习参与自我表达。这一转变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参政议政的革命热情,更使党的执政理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有效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形成了文艺大众化与群众政治化的双向互动机制。

四、陕甘宁边区媒介动员的历史成效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各种媒介动员及宣传教育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能和历史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提升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的抗战意识

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④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既不利于动员教育民众支援抗战,更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群众亦无革命觉悟去自觉践行党的方针政策。边区开展的扫盲教育运动,依托冬学、识字组、夜校等多

①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②《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

③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元化组织形式,有效推动大众文化知识的普及,全边区近6万人不脱离生产而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为后续各项动员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大规模民众教育成效在短期内显现,多数民众掌握基础读写能力,可独立阅读报刊、书写家信;部分青年还习得记账、度量、拟写便条等实用技能。靖边县的571名冬学学员中,164人可独立书写便条,40人能读懂《边区群众报》,99人掌握记账方法,71人能熟练运用珠算加减法^①,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为思想动员提供了认知基础。随着农民教育在边区的大规模全面铺开,能识字者越来越多,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一步步提高。

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动其对党的政治主张与抗战意义的深度认知,民族抗战意识随之觉醒。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虚假宣传与恶意攻击,边区报刊以新式劳动者话语为传播中介,通过劳动者亲身叙事开展舆论反击,其中《解放日报》对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的报道最具代表性。农业畜牧英雄贺保元以自身经历为证,驳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诋毁,详细讲述其在红军帮助下废除租债、分得土地与粮食的真实历程。通过普通劳动者的自我表述,直观展现边区生产建设成效与党的政策优势。此类传播实践不仅有效扭转了舆论导向,更在民众心中构建起对中国共产党与边区政府的正面认知,显著增强民众与党的互信度,推动民众在思想、政治与行动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最终为党凝聚广泛民众支持、开展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深厚的心理根基。

(二) 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创造了抗战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动竞赛与劳模塑造,显著改善了边区的经济与财政状况。随着劳模运动的深入推进,边区在农业、工业、部队建设等领域都实现了较快发展。劳动模范以高度的热情投入生产建设,积极推广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边区形成生产热潮,有效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1943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生产自给部分达38万万元,占全年总收入61万万元的62.3%^②,基本实现经济自给。这一成就不仅改善了民众生活,满足了社会基本物质需求,还为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边区报纸广泛宣传拥军生产运动,彰显边区民众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传播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民众生活的改善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百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前线。青年自愿加入自卫军,兼顾生产与战斗任务;群众节衣缩食,踊跃缴纳爱国公粮、捐资捐物,并协助八路军及边区政府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妇女则组织起来为军队制作军鞋、干粮,成立洗衣缝衣队和救护队。大量关于劳动模范和民众支前抗战的媒体报道,在边区营造了“劳动光荣、抗战爱国”的积极舆论氛围,同时对分化瓦解敌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 传播了党的执政理念,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一种新型组织与动员方式,劳模塑造通过媒介传播有效传递了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对边区政权的政治认同与向心力。

劳模塑造扩充了党的干部来源。劳模是经党组织塑造、具有一定政治象征意义的先进群体,他们坚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指出劳动模范是“干部的后备军”^③。劳模的选定标准与干部选用要求高度吻合,且经由民主推选与群众公认产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公信力。因此,劳模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协助传递边区政府政策至基层,增强了群众对党的理解与信任,从而扩大了党在边区执政的阶级基础。

劳模塑造规范并引导了群众的社会意识。边区政府所树立的劳动模范,体现了执政党对“新型人民”的期待,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经济上热爱劳动、思想上积极上进。这些模范人物成为符合边区建设需要的公民楷模,是经革命斗争与党的生产运动所培育的新型人民。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其政治立场、劳动观念和行为方式逐渐被广大群众所认同和效仿,强化了社会共同价值观,有利于边区治理和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党在边区执政的社会基础。

①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劳模塑造提升了党的公信力与群众认可度。该运动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物质与精神需求都得到较好满足,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劳模生产技术、先进思想与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群众积极参与生产实践,革命觉悟普遍提升,信任支持边区政府。这一过程极大增强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群众根基。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特殊环境里,创造性地改造并有效运用一切可接触的媒介形式。通过主流报刊改版、劳动竞赛推广、劳动模范塑造、群众自我书写等多样化策略,广泛传播党的先进理论与政策,极大增强了党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效巩固了边区政权,凝聚了民族抗战的精神力量,为抗战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重要的政治与群众条件。这一时期积累的媒介动员经验,对新时代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新时代,媒体形态与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①这一论述内涵深刻,对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提高媒介运用能力、深化传播规律研究、有效使用新兴媒体开展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其精神内核与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媒介动员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应汲取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守正创新,综合运用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接续发挥群众路线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动员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饱满的精神和干劲,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Effects of Media Mobiliz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I Zhongze & YANG Wenx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order to break the long-term public opinion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Kuomintang,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disseminate its revolutionary imag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rried out effective media mobilization practic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cultural scarcity. It overcame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by adopting diverse media mobilization form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labor competitions, model worker cultivation, and self-narration, while publicizing the CPC's revolutionary ideals and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se effort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CPC, ma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lso provided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shaping of the CPC's imag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ll-out wa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media mobi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校对 曾小明)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页。